

文物荆州

中国最古老的黄金货币——郢爰

□ 张卫平

在中国,货币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。考古发现证明,楚国不仅仅是最早铸行金币的,也是中国最早铸行银币的。1974年,考古人员从河南扶沟古城村的楚墓里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。这批银币的发现证实,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银币实物也是出自楚国。



1974年,考古人员从河南扶沟古城村的楚墓里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。这批银币的发现证实,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银币实物也是出自楚国。

1971年,考古人员在荆州古城以北的纪南城附近出土一块重17.5克的楚国金币。其实,楚国金币在楚地出土了很多,不过,与其他文物完全不同的是,在楚墓中几乎没有发现过金币。甚至,连楚王的墓中也是如此。

专家由此推断,当年楚国的法令是禁止金币埋入地下的,换言之,就是要求金币必须进入流通环节。

纪南城是当年楚国的首都,因在纪山之南而得名纪南城,也称郢都、南郢、纪郢。西晋学者杜预在《左传》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。

据说,王城脚下管得更严,为何却有人能违反法令将金币偷偷埋在地下呢?这,还要从楚国灭亡前后的形势说起。

楚国灭亡之际,秦将白起率60万大军杀入楚国,战败的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。战乱之中,逃命要紧,一大批无比珍贵的楚国金币就在战火之中或遗失、或散落、或埋入地下藏了起来。

不过,历史学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。据考证研究,楚人还有着与中原完全不一样的墓葬文化与储藏方式。据史书记载,“储蓄”一词始于战国时期。当时并无银行,其最原始的方式就是“窖藏”,也就是说把黄金盛放在陶器里存放进地窖或埋入地中。这种方式,一直延续到东汉前后。

在中国,货币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。考古发现证明,楚国不仅仅是最早铸行金币的,也是中国最早铸行银币的。

考古学家后德俊先生说:“令人惊奇的是,楚人不仅制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,而且也制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白银货币。这两种货币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使用贵金属货币的先河,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中也是仅见的。”

黄金是世界上最早有金属。所以,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货币仅仅只有拇指盖大小,金黄

锃亮,上面有清晰的“郢爰”字样。据说,目前官方定价一枚1亿元。

如果按照制造工艺命名,古代的黄金货币,又名印子金,或称金板、龟币。印子金是因金板上铸有方形的戳子而言。

楚国曾流行有一种有铭文的金板(版)。这种金板,大多呈方形,少数呈圆形,上面用铜印印出若干个小方块,看似乌龟壳。完整的重约0.5公斤,含金量一般在90%以上。金板上的铭文有郢爰、陈爰、专爰、卢金等等,习惯上被称为“爰金”或“印子金”。

这些黄金货币,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,在楚地湖北、安徽、陕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等地均有发现,尤其以“郢爰”为多。

“郢”是楚国的都城名,“爰”为货币重量单位。郢爰,就是楚国的金货币。据考古资料显示,我国出土的先秦黄金货币都是楚国制造,多年来,先后出土了4万多枚。

为什么楚国拥有如此众多的黄金货币?专家认为,这是因为楚国地域广大,拥有大量的黄金资源,楚人又了解黄金的物理特性,同时掌握了开采、冶炼黄金的技术,并制造了具有公信力、容易操作的称量黄金的精密衡器。通俗地说,这个衡器如同今天广泛使用的人民币点钞机。

说到黄金,在西汉刘向编辑成书的《管子·轻重甲篇》中记载有管仲的话,说是“使吾得居楚之黄金,吾能令农毋耕而食,女毋织而衣”。管仲的话,并非空穴来风。

据文献记载,楚国的黄金产地主要有四处,即:丽水(广西漓江或云金沙江)、沮漳河(鄂西一带)、洞庭(湘西西北一带)、汉中(陕西汉中一带)等处。而在楚地,也发现了很多套用于称量黄金的精密衡器——天平砝码,它包括天平杆、两个天平盘和环形铜砝码,无论样式还是原理都和今天我

们熟悉的天秤秤类似。

其中,保存最好、最完整的,当属1954年从长沙战国楚墓和1983年从荆州九店战国楚墓出土的天平与砝码。其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,都与今天的等臂天平相同。

楚国富了,有人就眼红了。一个国家,如果只富不强,注定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,楚国就是一个例子。秦军杀来,士兵占领了郢都,战车拉走了一车又一车金、银币和铜币。于是,秦始皇有了包括楚国在内六国的财宝做后盾,也就有了车同轨、书同文的财力资源。他还下令废除了各国的旧币,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。新铸的秦朝货币——“秦半两”,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圆钱形制而来,方孔圆形,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。

战国末期楚国阴阳学家楚南公曾说过一句话: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。果然,短命的秦朝被楚人推翻。这句话,用在楚国的金市上也是如此。公元前223年,楚亡于秦,楚国的货币失去了生存的条件,然而,在被秦灭了楚地却在方方面面都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,不但在秦始皇时代,直到西汉中期,楚国的金市仍占据着市场流通的重要份额。按照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的话说,就是“在汉武帝继位之前的那些年代里,是楚灭亡以后楚国黄金货币的黄金时代”。

一个灭亡国家的货币,居然躲过了秦朝“统一”的专制,延续到了西汉,真是一个惊人的奇迹。

楚人用金银当流通的货币,至少说明楚国黄金已经积累到相当的程度,再联想到楚国的国都纪南城,这个有着30万人、当年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,商业繁荣、贸易量巨大,金市的需求量相比更大,足以说明了那个时代荆州的富庶,堪比当今的“北上广”一线城市也。

江津风物

在沙市,老街“巡司巷”早已踪迹全无。殊不知在早年,它是沙市作为市镇而存在的巡司衙署所在地——据历史记载,明朝万历三年(1575年)的沙市巡司,叫范应瑞,是位列九品的朝廷命官。

巡司巷是条南北向的街巷,它北接中山路,南达荆江大堤的轮渡码头,全长不到200米。在6岁那年,我家迁入巡司巷。那时巡司巷的名称已经改作中山横街了,而我家租住的这座宅子,就在街内老巡司衙署的隔壁。巡司衙门是改建过的,旧建筑形制早已荡然无存。它坐西朝东,正对着中山后街(早年叫夹赏街)。记得2000年荆州聘请全国名城保护委员会的专家来审定“名城保护条例”,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良皋教授说,他说:明清两朝的地方官衙署,在大门通常皆为“丁”字街,为的是一旦发生武装攻击事件,卫队便于保护侧后方不受冲击。现在看来,沙市巡司衙门正处在的交岔点上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明清两朝,沙市作为口岸市镇,设立巡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弹压歹徒骚动,维护地方治安,所以在这方面上,巡司衙门就是地方官最高衙署的所在地。清雍正七年(1729年),因此地正当长江渡口,商贸发达,市廛繁华,更兼人口稠密,五方杂处,社会治安问题愈来愈突出。于是朝廷敕命湖广行政,将荆州府通判厅从城内迁出,移至沙市办公,巡司衙门这才降格成为基层办事机构。

巡司巷老街正对着长江渡口,长年人往人来,非常繁华。一条街长不到200米,却设有旅社、货栈、酒店、百货店、服装店、日杂店、伞铺、丝烟铺、理发铺、雨靴铺、酱园等二十多家店铺,一家家生意红火,热闹非凡。那一条青石板铺设的长街,被人们的鞋底板磨得光滑净亮,隔三五年就得请石工来碾磨一遍,以防路人滑跌。

巡司巷的众多店铺,最令人称奇的就是雨靴铺。旧时代,橡胶是我国的稀缺物质(那时塑料好像还处于实验室阶段),胶底的力士鞋绝对为奢侈品,人们多穿布鞋,故逢到雨天根本没法出门。店铺的匠人们用木板做履状底,再用帆布制成靴状鞋帮,密密地用小钉钉在木底上,然后在靴帮上刷桐油使之防水;由于一遍又一遍的桐油浸渍,故靴帮阴干后坚韧如牛皮。这种靴的靴底本用木条垫高,再钉上铁制圆锥体的靴钉,穿上后便使人于倏忽间即高过两寸,所以当年穿雨靴不啻练高跷功,脚下的“桩子”自然特别地稳。由于制作工序繁复,故雨靴作为商品其价格自然不菲,进入家庭后往往便成为这户人家的传家宝——若是养护得好,穿上三五代人都是常事。

巡司巷还是沙市人人夏看水的绝佳去处。每到太阳落山之后,各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上堤看水,一则是图江风凉爽,来这里看看水情变化,稍带凉也乘了凉;再则此地早在清末便修建有一段坚实牢固、平整美观的石驳岸,便于人们伫立江岸,引首远眺。

清咸(丰)、同(治)年间,荆江水患愈演愈烈,而朝廷内外交困,无暇不暇,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整修的荆江堤防,于是只有任凭洪水肆虐,糟践两岸生灵。沙市商民云集,财力略丰,广大商民因饱受水灾之苦,故众人同仇敌忾,在堤防修建上竭力尽心,乃于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采用官建民助方式,集资整修二郎门至九粮桅的堤防计五百丈长。施工时先是靠岸抛填毛石,以奠根基;再以三合土充填堤身,并层层夯实;另于迎水面则采取垒砌护坡石岸的工艺,增强堤岸的抗水能力。这护坡石岸共分四层,每层约五尺高、五尺宽。当工程竣竣时,全市商民万人巷空,全都前来参与这一盛典。史称其“一时游人、传客、耆老妇孺靡不手称庆,载道欢声,以为此固百世之利也。”事后,荆州府知府舒惠还特撰《新修驳岸碑记》,立于沙市巡司巷堤头,以记其盛。

1929年7月8日上午10时,随着轰的一声巨响,巡司巷下首的江堤驳岸被日清公司的客班船“信阳丸”撞开了一道大裂口。堤头工部现场测量,这道裂口长达14、5米,宽7米余,深3米多。此事发生时,正当长江夏季汛期已至,市上人心惶惶,流言纷飞。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瑞闻讯,火速照会日本驻沙领事,于次日上午10时会同日驻沙领事官福内孝、日清公司大班北岛静等赶赴现场,查勘损坏情况。徐国瑞同时发电向湖北省政府汇报,并提出四条郑重声明,要求追究赔偿等事宜。日清公司的全称“日清汽船株式会社”,是1907年由日本邮船、大阪商船、大东汽船会和湖南汽船会等四家航运企业合并而成,主要从事经营中国长江流域和中日沿海的航运业务。“信阳丸”排水量为4200吨,在长江客轮当中,应为大吨位的船只。对这次大船撞岸一事,人们强烈呼吁:当洪峰迭至之际,“信阳丸”给沙市造成这么大的危害,绝不能让日本人一走了之。

前一年,因“东北易帜”,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,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,不久即发生蒋、桂战争,随即又是蒋、冯开战,而山西的阎锡山又受蒋介石指使,寻机囚禁了冯玉祥……日本政府见中国国内的事情闹得一团糟,故意对此事一再拖沓,有心让时间一久,此事便不了了之。可湖北的武汉、黄石、宜昌,连同上海、南京、芜湖、万州与重庆等长江沿线的港口同仁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,同仇敌忾,众志成城,一再要求方日方赔偿,否则,将阻止日清公司的轮船进港。在这种局势下,日方拖至1930年元月16日,终于同意赔偿1500万元给沙市修复驳岸。

事后,沙市民众曾在巡司巷堤头上,树立了一方《日清公司赔偿碑文》,以记其事。试想,自1896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以来,中国对日外交实可谓屡屡受挫,乏善可陈。“信阳丸事件”虽索赔款不过区区1500万元,但它真切地表达出沙市民众不甘欺凌、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与不屈意志。这方石碑虽经沙市沦陷而亡其所踪,但此事应当永远铭刻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的社会档案中。

解放后,人民政府在巡司巷设立工人俱乐部,成为当时沙市最为繁华的公共娱乐场所。在这里,有彩灯闪烁的舞厅,宽敞静谧的图书阅览室;公共大浴室,以及一座中型歌舞剧场。那时,从侧门往后至,是个灯光球场,夏秋两季,每逢周六、周日都会放露天电影。在这里,我看过当时堪称稀奇的彩色影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令人大饱眼福。

沙市的巡司巷历史十分悠久,它至少见证了地方上六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。如今,它虽然已经残破褪尽,了无踪迹,但它那古朴、灵动的社会风情,依然令人难以忘怀。



沙市巡司巷、中山横街 (赵楚辉摄)

滨江临堤的老街「巡司巷」

□ 陈礼荣

岁月拾零

头头是道——沙市理发业的变迁与记忆

□ 罗星航

理发是头上大事,马虎不得,虽极平常,也颇慎重。头发、头型代表精神面貌,体现时代特征,折射出城市记忆、民俗文化、风土人情,更彰显着美好追求和历史变迁。

江汉平原物产丰饶,商贾云集。几千年的发展史,也是头发不断变化的历史。从披头散发过度到挽髻,从随心所欲到梳理头发,从无心打理到追求美感,人类经历了漫长岁月。沙市理发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并成为一个行业,是清朝以后的事。那时规定,男的除了后脑勺留下巴掌大一块蓄发梳髻外,其余的头发连胡须统统剃光。强制推行“留发不留头,留头不留发”,沙市人称之为“圈头”的样式就这样被推广,理发担子虽多了许多,但自己的头自己终究做不了主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里,有一段画面记忆深刻,张勋复辟帝制,北京城到处是头上亮光光的辫子,假长辫挂在街头招摇过市,许多人身穿青色长袍马褂,头戴瓜皮小帽,足蹬双梁布鞋,骆驼缓缓移步,风沙漫卷古都,一幅苍凉、悲哀、颓废、战乱的场景,让人为之思变。

理发业与社会、城市发展密不可分,理发人的成长始终与家运国运相伴。据《沙市文史资料》记载,清乾隆年间,沙市彭姓襄阳人开设了“彭记理发店”。民国建立后,人们剪掉了辫子,头上的事变得复杂且繁忙起来,理发担子忽然增多,固定理发店迅速发展,那时手推剪还是稀罕物,一般市井百姓还不敢用这种“机器”剃头。

民国17年(1928年),沙市理发店8家,理发担子150副,从业人员460人。除东洋头(平头)、西装头、俄国头(球型头)等新兴头型外,大多仍停留在“和尚头”的水平,普通人理不起像样的头,只能匆匆了事。理发店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传统的木凳改为木折叠椅,趟在上面,一下子让人舒服了许多。达官贵人、商号老板专请师傅提着箱子上门做“包活”。后来又有店铺到上海邀请了扬州师傅来沙市合伙开店,“新华店”是最早的。扬州师傅带来的10把最新

式的铁铸转椅,48英寸配套大磨光镜等设备,提高了沙市理发行业的技术含量,剪吹西装头,火钳烫发也开始流行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沙市理发行业也分为十三帮,大都以理发师傅的出生地划分。沙市、江陵的大帮,潜县、安乡、公安、石首的潜帮,襄樊、荆门、当阳的襄帮,汉口、武昌、汉阳帮,江苏、浙江的下江帮等等,其中以下江帮的手艺最好。十三帮各推一名坐头成立行帮会,再推举两名正副坐头,负责处理行帮事务,维护行帮利益,调解帮会矛盾。最先说白玫瑰理发厅,1937年又开了“中央理发店”(在今社工部巷口)。到1949年,“东亚”(现中山路碧绿春茶叶店处)“南京”“大观”“万国”曾名噪一时,只不过“南京理发厅”生意最好。

理发是技术活,过去理发师傅地位低下,生活清贫,经常遭到地痞流氓欺负,而且学手艺很不易。拜师学艺要签“字据”,“三年中生病吃药,车前马后,跳河落井,概由自己负责”。学简单理发尚可,要想学理发简直不可想象,完全靠自己琢磨钻研,师傅也得保住最后的饭碗。还有的靠理发不能养家糊口,只能在外为别人看门,当保镖,要不就是凭手劲做按摩师。

解放初期,社会风气提倡简朴,沙市理发从业人数减少至200人。据《沙市市志》(1999年版)介绍,1954年,由一些有劳资关系的南京、一乐也、新美、佑记、大光明、长生堂等九家理发店,组成南京理发互助组,分设36个门店,随着烫发的兴起,理发业应接不暇。1985年,沙市的南京、沙厅、长虹、江汉、红星理发店生意红火,加上广州、温州、武汉迁来的理发店,新设的24家美发店,还有机关、工厂、公司的理发室,沙市理发行业异常火爆,理发师傅近千人。冷烫、热烫、药剂烫、热吹工艺、新式染发技术逐渐推广开来。男发经过吹、烫,有了波浪、螺旋、鸭子、飞机、包头等形状,女发更是多样,学生式、青年式、劳动式、运动式、家庭式、凤凰式、孔雀式等,师傅忙到晚上12点都不能歇息(见

《沙市市商业志》1987版)。

其中有一段往事十分有趣。内荆河畔,所在的地方青点依堤而建,前有炊烟缭绕的农户,背靠波光粼粼的河水,充满诗情画意。生活却很单调枯燥,收工后无所事事,于是男生都学理发,你帮我理,我帮你理,工具也很简单,一把推子,一把小剪,再加一把梳子,一条围布。大家吃完晚饭,就坐在门口,望着谁谁的头发有点长,硬是拖来剪了,也不论水平怎样,反正都不出远门,管它呢。

后来,对面农户的四个小孩经常过来玩,我们也时常给他们好一点的菜,其实并不怎么好,总是香干子、醋溜白菜、鸡蛋汤之类的,品种少,油很多,比农民家的伙食稍微强些。这下好了,孩子们成了男生提高理发水平的试验品了,今天你来一下,明天我来一下,孩子们的头发永不见长,因为隔不了几天就被拉来剃了,而且发型千奇百怪,家长也不怪罪,只当好玩了。从此,我们就盯着孩子们的头发,总盼望快点长出来。记得那是双抢(割早稻、晚稻)时期,特别忙碌,每天很早就下田,中午由炊事员送来饭菜,大家田头吃,喝沟里的水,树荫下短暂休息。闲聊时,小张说起孩子们有几天没剃头了,男生们纷纷应和。说着无意,听者有意,下午干活时,小李突然请假,说是闹肚子。收工后,远远的,望见那四个孩子头皮发光的,小李拿着剪子在旁边嘿嘿笑,真是,太有心机了。我们一起哈哈大笑。看来又要等几天了。

头上的事真不算了什么,但人们越来越看重。许多年来,沙市的理发店有高档的,中端的,更多的是路边小店,方便实用,价格便宜。记得中山路、北京路、胜利街、红门路、解放路都有很好的理发店,中山路的南京店、工艺美术大楼旁的店、北京路江汉路交汇的江汉店,生意都特别的好。后来,街头挑担子理发的少了,便河东路早



有三个小摊,沙市商场处原有理发担子,再后,大庆路与太湖路交汇的大桥上,也有挑担师傅摆摊。还有,剃头挑子一担挑,原来这担子是一头有烧热水的炉子,另一头放的是理发家什。如今,要想在街上见到剃头挑子,那真是如获珍宝。

眼下,男士理发很简单。女士的头就难弄多了。光洗和吹还算简单,假如要洗、剪、烫、染全套,不花三四个小时根本下不来。选择理发,裁剪头发,分区上药水,上杠卷、烫发机加热、拆杠卷、整理,光坐在烘干罩里就得花小钟头,真难熬啊。人们只愿有男士陪逛街的,陪吃饭的,陪看电影的,却没见过有男士坐在理发厅陪着烘干的,可能要么去转悠了,要么就根本不来,没那份耐心呢。这不,光发型风格,就分复古、非主流、日系、可爱、淑女、韩式、森女、田园式。从发型类别,就有扎发、盘发、蛋卷发、花苞头、梨花头、荷叶头、丸子头、自然卷、蘑菇头,还有什么蝎子辫、麻花辫、鱼骨辫、脏辫等等。生活好了,女士格外爱美,风姿绰约的身影,异彩纷呈的发型,昂首挺胸的姿态,筑起城市靓丽的风景线,令人目不暇接。

说起旧时理发,不得不提王尚静,王先生1919年出生,沙市南京理发厅理发师,《沙市市商业志》中记录的唯一一位理发名师,1933年便在武汉学艺,1950年来沙市定居。王老先生勤于钻研民族发型,根据顾客年龄、职业、脸型、爱好和不同季节,梳理出20多种朴实、大方的发型,对常见的软发、硬发、皮发、沙发、编发的理、烫,都能挥洒自如,其理烫的发型保持时间长,美感强,深受广大喜爱。

1978年,湖北省商务厅授予王尚静特级理发师职称。